

## 另一種戰爭： 1942 年國民政府對英屬緬甸的政治情蒐及宣傳

廖文碩\*

### 摘要

本文主要運用中英官方檔案，輔以日記、回憶錄等資料，從政治戰、情報戰與宣傳戰層面，探討 1942 年緬戰前後國府對英緬政治情蒐及宣傳工作。首先鋪陳日軍南進總體戰略衝擊，其次以兩件蔣中正（1887-1975）批交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等參考之關鍵情報為中心，說明緬戰前夕國府對英緬政情之認識與策略評估，各主要情報機構皆有活動呈報；復次探討緬戰爆發後國府「對緬國民外交實施方案」內容及其執行困境；再次探討國府與英緬國防局約定合作，以及緬甸陷日後，國研所主任王芃生（1893-1946）向英方高層之宣傳提議過程與結果；最末析論第一次緬戰前後國府對英緬政治工作策略得失，尤其是戰時情報機構與外交系統分頭進行、各方競爭情形，對國府與英方情報及宣傳合作的後續影響。

關鍵詞：德欽黨、軍統局、政治作戰、蔣中正、王芃生

---

\* 國史館修纂處簡任協修

本文初稿曾於 2019 年 7 月 27-28 日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辦之「中國遠征軍與中緬印戰區學術研討會」上宣讀。感謝呂芳上、周惠民、劉維開、林桶法、張瑞德、邵銘煌、朱浚源、吳淑鳳諸位先進提攜與指教，以及匿名審查人悉心斧正。

##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Political Intelligence and Its Propagandist Activities in British Burma Before and After the Burma Campaign, 1942**

Liao, Wen-shuo \*

### **Abstract**

This paper draws upon government documents of the R.O.C. and the U.K., supplemented by diaries, memoirs, etc., and examines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political intelligence and propagandist activities in British Burma before and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Burma Campaign, 194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olitical war, the intelligence war and the propaganda war. Firstly, it delineates the impact of Japan's southern advance a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examines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understanding and strategic assessment of the British Burmese political situation as well as the activities of its intelligence agencies on the eve of the campaign by focusing on two reports that Chiang Kai-shek (1887-1975) handed over to the Kuomintang's Secretary-General and others for reference. This is followed by discussions of "People's Diplomacy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Burma" and its implementation difficultie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the Burma Defense Bureau, and the propaganda proposal to high-level British officials by Wang Peng-sheng (1893-1946),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IR) after the fall of Burma. Finally, it analyzes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intelligence efforts in Burma during this time, especially the competitions among intelligence agencies and diplomatic system,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Nationalist China-U.K. relationship of cooperation in intelligence and propaganda.

**Keywords:** Thakins (Dobama Asiayone), Juntong Ju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BIS), political warfare, Chiang Kai-shek, Wang Peng-sheng

---

\* Researcher, Department of Research and Compilation, Academia Historica.

## 壹、前言

日本自 1936 年廣田弘毅（1878-1948）內閣通過「國策基準」，主張為實現東亞安定，維繫帝國生存發展，確立以大陸對華政策為核心，並逐步將南洋納入勢力範圍的對外擴張政策。然而 1937 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後，日軍戰事進程未如預期，為斷絕國民政府軍需補給外援，繼全面封鎖中國海岸線後，切斷國府通過中南半島法屬印度支那及英屬緬甸運輸要道，成為日軍重要戰略目標。1939 年秋歐戰爆發後，日本加速與德、義軸心結盟，轉向南進路線。1940 年 7 月，近衛文麿（1891-1945）內閣通過「基本國策綱要」，明確提出以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為宗旨的南進政策目標。<sup>1</sup> 同月，英國受日本所迫協定封閉緬甸路線 3 個月，9 月日軍進駐法越，國府對外桂越、滇越線隨後喪失。10 月上旬，英國宣布重開緬甸路線，滇緬公路成為中國西南大後方唯一之國際交通命脈，緬甸因之為世人注目。

國府自 1938 年底滇緬公路通車以來，與緬甸當地英緬總督府官員和在野勢力互動升溫。國府先是為對日作戰國際交通、軍需補給和商務擴展等需要，應英緬督府要求派軍事委員會西南運輸處處長宋子良（1899-1987）赴緬接洽交涉，1939 年 4 月將仰光領事館升格為總領事館，同年 9 月派太虛法師（1890-1947）率佛教訪問團，12 月有緬甸德欽黨領袖吳努（U Nu, 1907-1995）一行訪渝，1940 年 10 月由考試院院長戴季陶（1891-1949）報聘，接續同年 12 月緬甸記者協會親善訪問團、1941 年 1 月英緬督府代表團訪華，1941 年 1、2 月則有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部長吳鐵城（1888-1953）所領宣慰南洋團、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商震（1888-1978）所領軍事考察團等先後抵緬，9 月長駐仰光的原任外交部次長曾鎔浦（1885-？）奉派為行政院駐緬代表，並率代表團與英緬督府交涉移民問題等。戰時中央主要情報機構亦隨滇緬運輸開通統制，先後派員入緬活動。

---

<sup>1</sup> 依據近衛內閣 1940 年 7 月 26 日閣議，該綱要開宗明義確定國策基本方針為：「皇國基於八紘一宇之建國精神，為確立世界和平，首要建設以皇國為核心、以鞏固日滿華結合為基礎的大東亞新秩序」，復規定對外施策「以解決南方問題為目標」，以及在考慮內外各種情勢下，「為解決南方問題，也要行使武力」。詳見日本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註主要文書》下卷（東京：原書房，1966），頁 436-437。「大東亞新秩序」之涵義，則結合軍部計畫，進一步擴大為「以日滿華為一環，包含大東亞的協同經濟圈」。相關研究參見臧運祜，《近代日本亞太政策的演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尤其是第 4-5 章。

按國府時期以黨領政，中央情報機構最早可溯至 1928 年陳立夫（1900-2001）奉蔣中正命所設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後有戴笠（1897-1946）所領力行社特務處起而抗衡，組織日漸擴大繁複、彼此競爭衝突，歷經幾度改組、整併，1939 年以後因軍委會侍從室負責處理各方呈送情報、管考各情報機構，形成對日作戰時期以侍從室為中心的情報體系運作。<sup>2</sup> 依據國府 1942 年實施各情報機關服務規章，為明確分工、避免無計畫發展，中央各情報機構及其業務分配排次依序為：一是主管各黨派偵查與經濟調查及相關檢察等之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局），二是主管敵奸組織偵查與經濟檢察等之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三是主管敵情及敵國國際關係調研之軍委會國際問題研究所（簡稱國研所），四是主管敵國、蘇聯、英、美等各國軍事情報之軍令部第二廳，以及最末主管英、美、蘇聯等各國一般政治、經濟情報之外交部情報司。<sup>3</sup>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南洋情勢丕變，日軍乘勢進駐泰國，迅速著手南北發動緬甸作戰，緬人所組獨立軍亦隨日軍入緬展開戰鬥。國府與英方協議，派出遠征軍援緬，緬戰其間蔣三度赴緬前線視察，中英軍隊並歸交中國戰區參謀長美將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 1883-1946）統籌指揮，戰事持續至 5 月底日軍占領緬甸全境暫告休止。日軍厲行南進政策，短時間內得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星、馬、緬等英帝國殖民地，與日本軍政當局掌握當地政情，策動宣傳反西方殖民統治、號召「亞洲為亞洲人之亞洲」大亞細亞主義思想，結合抗英獨立運動力量，有密切關聯，學者視為一場「政治戰」。<sup>4</sup> 反觀國府著眼緬甸戰略地位，面臨日軍總體戰攻勢，復因英國中央遠東政策綏靖主義當道，國府對英外交與軍事合作阻滯下，緬戰

<sup>2</sup> 有關國府情報體系沿革及各機構相互競爭情形，參見張瑞德，《無聲的要角：蔣介石的侍從室與戰時中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7），頁 71-136；廖文碩，〈情報與外交：從檔案論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1937-1946）〉，《成大歷史學報》，第 56 號（2019），頁 96-101。

<sup>3</sup> 〈中央各情報機關業務分配表〉（1942 年 7 月），《蔣中正總統文物·全面抗戰（二十一）》，國史館藏，002-080103-00054-007。該業務分配表並未列入 1940 年成立之情報機構軍委會技術研究室，或因其主管業務為國內外密電研議、統計及電訊偵收測向，分工相對明確。

<sup>4</sup> 相關研究舉要如：Christopher Bayly and Tim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The Fall of British Asia, 1941-1945*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rologue, Part I: Escaping Colonialism; Jeremy A. Yellen,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When Total Empire Met Total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29. 如「西方兵聖」普魯士軍事家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解析戰爭本質名言：「戰爭無非是政治透過另一種手段的延續」，從政治到戰爭往往僅是暴力運用與各種敵對意志衝突尖銳化的區別；20 世紀戰爭尤其高度工業化、官僚體制化、民族國家化，深刻形塑現代國家，戰爭所牽涉參戰各國國家體制、政治理念、社會民情歧異與對立等因素，早為學界所重視。

前後對於英人治下緬甸朝野政情、華僑僑情、日人政治滲透及宣傳活動有何認識？作何因應與策略運用？其成敗得失及影響又是如何？實為吾人欲深入理解緬戰脈絡所不可忽視之重要面向。

近年學界有關戰時滇緬運輸、緬戰及國府對英緬關係研究，與情報機構相關者，如李君山透過軍委會先後所設西南運輸處與運輸統制局，分析滇緬公路路政與國府搶運措施問題，指出軍統局自西運處成立後即與之形成長期合作關係，先後掌西運處警衛稽查組與運輸局監察處，布建警網查緝弊端、監督搶運；王文隆探討戰時中國國民黨在緬甸開展黨務等活動情形，包括中統局與英方在緬甸情報合作嘗試，以及國民黨對緬甸獨立運動所持態度與雙方關係；筆者探討王芃生領導國研所對日情報工作所發揮隱蔽外交作用，述及國研所參與策動開放滇緬公路，以及王芃生於1942年3月奉蔣中正命以國防最高委員會外交專門委員身分，入緬協助聯繫英緬高層經過，著重其與國研所、英國特別勤務處（Special Operation Executive）在華情報與宣傳合作發展之關聯。<sup>5</sup> 此外，左雙文、劉杉指出戰時國府為維繫中緬通道，致力於推動對緬關係，重視印、緬獨立運動，給予同情支持，體現大國胸懷；有關緬戰、緬人獨立運動與臺灣、緬甸華僑角色等，中外學界亦有若干新論。<sup>6</sup> 國府面臨英、緬、日各方競合角力，所從事對英緬政治情蒐、聯絡與宣傳工作，隨戰爭情勢發展，歷經數度轉折，惜學界仍缺乏討論。

<sup>5</sup> 李君山，〈抗戰時期西南運輸的發展與困境——以滇緬公路為中心的探討（1938-1942）〉，吳淑鳳等著，《不可忽視的戰場——抗戰時期的軍統局》（臺北：國史館，2012），頁109-142；王文隆，〈抗戰時期中國國民黨對緬甸的接觸與政策〉，汪朝光主編，《再認識與再評價：二戰中的中國與亞洲民族獨立運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頁136-152；廖文碩，〈情報與外交：從檔案論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1937-1946）〉，頁91-131。另馬振犢、邱錦探討中統局戰時對英合作，涉及對英緬合作，包括1942年中統局協助英方訓練留印海員組建戰工隊，派熟悉緬情隊員加入或聯絡服務遠征軍，以及同年中統局與英緬國防局協議合作建立緬甸情報網等。馬振犢、邱錦，〈抗戰時期國民黨中統特工的對英合作〉，《抗日戰爭研究》，第3期（2006），頁160-192。

<sup>6</sup> 左雙文、劉杉，〈國民政府戰時對緬關係及對印緬民族獨立運動的關注〉，汪朝光主編，《再認識與再評價：二戰中的中國與亞洲民族獨立運動》，頁153-164。近期緬戰研究舉要如：Frank McLynn, *The Burma Campaign: Disaster into Triumph, 1942-4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藤井元博，〈中国国民政府の対日戦略と軍事作戦——1942年のビルマ戦を事例として〉，《戦史研究年報》，第22號（2019），頁1-29；蘇聖雄，〈關鍵環節：第一次緬甸戰役中的林蔚及其參謀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3期（2021），頁77-130。有關翁山等人附日抗英武裝行動與臺灣之關聯，參見蕭明禮、朱宏源，〈日本侵緬之戰（1940-42）與臺灣的角色〉，《亞太研究論壇》，第67期（2020），頁1-40。近期有關緬戰前後華僑抗日組織及活動，主要援引《緬甸華僑志》、《緬甸華僑歸僑抗日史料選輯》等討論，參見李盈慧，〈抗日與附日：華僑、國民政府、汪政權〉（臺北：水牛出版社，2003），頁41、203-204；朱宏源，〈中日首戰緬甸（1942年）與華僑華人〉，黃自進、潘光哲主編，《中日戰爭和東亞變局》（臺北：稻鄉出版社，2018），頁123-196。

總之，本文宗旨在探討國府於 1942 年第一次緬甸戰役前後，透過中央情報機構對英緬朝野政治動態、僑情、日人政治滲透等之情報蒐集與運用，解析國府當局對緬政治認識正誤與策略成敗，有別於過往軍事史角度，從政治戰、情報戰與宣傳戰層面，呈現國府在緬戰的另一重要面向。文中所探討情報機構，依第一次緬戰同年中央明定業務分配與各機構實際工作範圍，聚焦於徐恩曾（1896-1985）所領中統局、戴笠所領軍統局、王芃生所領國研所，並旁及其他有關機構。資料上主要使用國史館、國民黨黨史館、英國國家檔案館館藏等中外文檔案史料，輔以日記、回憶錄等，詳細爬梳、解讀多種史料，並考證其中因語言與今昔差異所形成駁雜繁複之譯名與歷史脈絡。行文上首先簡要鋪陳日軍南進總體戰略衝擊下的英屬緬甸以作為背景，其次以兩份蔣中正批交國民黨中央黨部等辦理之關鍵情報為中心，<sup>7</sup>說明緬戰前夕國府情報機構對英緬政情之認識與策略評估，從聯絡緬甸主要政黨到對親日人士之拉攏；其次探討緬戰爆發之後國府「對緬國民外交實施方案」內容及其執行困境，包括工作性質爭議、民情隔閡、機構與人事紛爭等；再次探討中統局、海外部與英緬國防局約定合作，以及緬甸陷日後王芃生向英高層之宣傳提議過程與結果；最末析論 1942 年緬戰前後國府對英緬政治工作之策略得失，特別是戰時情報機構與外交系統分頭進行、各方競爭情形，對國府與英方合作的後續影響。

## 貳、日軍南進衝擊下的英屬緬甸

回顧緬甸自 19 世紀漸次淪為英人殖民統治，成為大英帝國「王冠之珠」印度與中國、法越的緩衝。英國治緬原將其納為英屬印度之一省，由印度總督府管轄。1920 年代以降，緬人政治參與及民族觀念勃興，緬印衝突日熾，英國為因應緬人脫離印度統治體系之強烈要求，於 1935 年制定「緬甸政府法」（Government of Burma Act），1937 年 4 月成立緬甸總督府，賦予緬人有限之自治權。儘管新法與獨立督府標誌了緬甸地位的顯著提升，然而對於大多數的緬人政黨組織與民族運動者而言，

---

<sup>7</sup> 即侍從室分別於 1940 年 2 月、1941 年 11 月轉呈蔣中正之〈緬甸主要政黨動態與我方工作方針〉、〈緬甸政黨勢力消長與我今後對策〉情報各件。

漸進式變革方針雖可接受，擺脫殖民統治的終極目標猶似遙不可及，緬甸與同屬英帝國之加拿大、澳紐等自治領地位相較，尚且仍有相當距離，失望情緒蔓延。<sup>8</sup>

英緬督府成立後，緬人政黨組織為爭奪政權更形活躍，卻往往成為因利益關係臨時結合之集團與政治活動工具，缺乏思想行動黨綱與政策主張，政黨分合頻繁。自 1920 年成立、追求緬甸自治之全國性政黨組織緬甸各協會大會（General Council of Burmese Associations, GCBA）於 1930 年代初期瓦解後，所重組包括聯合 5 個小黨之統一黨（United GCBA，或稱五團聯盟黨或譯五星黨，Ngawbinwsaing or Five Flowers Alliance）、蘭特黨（Hlaing-Myat-Paw GCBA）等較具代表性之外，尚有首任總理巴莫（Ba Maw）為選舉組織之窮人黨（Poor Man's Party）。第 2 任總理吳普（U Pu，生卒年不詳）、第 3 任總理吳紹（U Saw, 1900-1948）均出自統一黨體系，吳紹脫黨後自組愛國黨（Patriot's Party），為著名之親日派。與組閣之各政黨相抗衡，由緬甸最高學府仰光大學畢業之知識青年為主體所組我們緬甸人協會（Dobama Asiayone or We Burmans Association），俗稱德欽黨（Thakins），成為緬甸獨立運動主力。德欽黨人為尋求外援抗英，游移於與印度國民大會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日本政府等合作路線之間，復於歐戰爆發後為響應團結各黨派民族主義目標，與巴莫窮人黨等組成一自由集團（Freedom Bloc）對抗督府。

日軍方面著眼於與緬人抗英民族運動者合作可期，為策動緬境武裝暴動、援助緬甸獨立目的，1941 年 2 月於曼谷所成立特務機關南機關，源自 1920 年代中期以來日本海、陸軍在緬諜報活動的各自發展與整合。先是海軍方面，國分正三（1891-1974）大尉於 1924 年進入仰光，開設診所掩護行動，1932 年出任仰光日本人會會長，與德欽黨人等多方接觸，並受託赴滇緬公路沿線、緬境油田等實地調查與蒐集情報，向時任海軍省次官山本五十六（1884-1943）等提供情報。向來主張南進政策之海軍為因應東亞情勢進展，曾要求國分提出「緬甸施策大綱」，同時由德欽黨人草擬「緬甸獨立計畫書」等。其次陸軍方面，鈴木敬司（1897-1967）大佐為蒐集緬

<sup>8</sup> 關於英國統治緬甸至緬甸獨立，近期研究參見 Michael W. Charney, *A History of Modern Bur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5-71; Christopher Bayly and Tim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the Fall of British Asia, 1941-1945*; 陳鴻瑜，〈緬甸史〉（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6），頁 118-171。有關緬甸種族問題與民族運動多路線發展，參見 Andrew Selth, "Race and Resistance in Burma, 1942-1945,"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20, No.3 (May 1986), pp. 483-507; U Maung Maung, *Burmese Nationalist Movements, 1940-194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甸民族運動情報，1940 年中以日緬協會書記長身分、化名南益世入緬，採取具目的性之行動路線，隨即與德欽黨元老密切往來，同年底於東京迎接試圖與中共聯繫未果的翁山（Aung San, 1915-1947）等人，資助受督府鎮壓而逃亡海外的緬獨運動人士。在海、陸軍協同下，鈴木出任直屬日軍大本營、別名南方企業調查會之南機關首長，海軍隨後因雙方人員摩擦協議撤出，由陸軍人員培植組訓緬甸獨立軍（Burma Independence Army），積極備戰。<sup>9</sup> 與此同時，由於盟國及日本同樣需要與中國及亞洲殖民地內部各種勢力合作，殖民地長年醞釀欲從西方列強桎梏下獲得獨立與平等地位之主張，已成為盟國與日本共同面臨之重要戰略課題，促使日本內閣進一步定義大東亞「共存共榮新秩序」之戰爭意識形態，旨為取得先機，於不斷擴大之世界大戰局勢中，為日本帝國保留空間。<sup>10</sup> 國府歷經數年獨立對日作戰，在外交上逐漸確立以爭取美國，影響英、蘇之方針，在確保緬甸國際運輸要道問題上，面臨英國為遠東利益對日妥協、對國府軍事合作提議始終冷淡以對，正常外交管道頻頻受挫。<sup>11</sup> 從檔案可見，國府中央主要情報機構於運輸統制監督查緝之外，開始積極投入對英緬政治情蒐與宣傳工作。

## 參、緬戰前夕中央情報機構對英緬政情之認識與策略評估

### 一、與緬甸主要政黨之聯繫

1940 年 2 月下旬，依蔣中正指示，由專辦情報之侍從室第六組函致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傖（1887-1946），附抄所整理「緬甸主要政黨動態與我方工作方針」

<sup>9</sup> 有關鈴木敬司、國分正三個人經歷，參見秦郁彥編，《日本陸海軍總合事典》（東京都：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頁 86、209。鈴木入緬身分，另有化裝為僧侶或《讀賣新聞》記者等不同說法，本文以太田常藏研究為據。南機關研究參見太田常藏，《ビルマにおける日本軍政史の研究》（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67），頁 37-54；日本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ビルマ攻略作戰》（東京都：朝雲新聞社，1967），頁 8-11、117-134；Christopher Bayly and Tim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the Fall of British Asia, 1941-1945*, pp. 8-14；齋藤照子，〈二戰時期日軍對緬工作機構—南機關再考〉，《南洋資料譯叢》，第 2 期（2009），頁 49-56。

<sup>10</sup> Jeremy A. Yellen,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When Total Empire Met Total War*, p. 20.

<sup>11</sup> 侯中軍，〈二戰爆發前後國民政府的中法英軍事結盟計劃〉，《近代史研究》，第 3 期（2019），頁 67-82。



情報一件，並隨後由葉楚傖批示轉交外交部長王寵惠（1881-1958）、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張羣（1889-1990）、中宣部部長王世杰（1891-1981）、副部長董顯光（1887-1971）徵請意見。<sup>12</sup> 該情報開端即指：「緬甸政黨情形複雜，組織多不健全，極易為人操縱。政黨之具有歷史者，除統一黨及平民黨外，餘不足道。最近始有一新露頭角之自主黨〔按：即德欽黨〕，勢力龐大，蔓延全緬。」其次依「緬甸現勢」、「我應聯絡自主黨」兩部分，分述緬甸最新政情與我方所應採取之工作方針。

按 1937 年 4 月英屬緬甸總督府成立，依據「緬甸政府法」規定，由人民選出之國會議員多數黨黨魁組閣，總理及閣員由總督任命。內閣最初僅設內政、財政、土地及歲入、農林、工商、教育 6 部，部長由國會議員中選派，各部另設英籍秘書掌握實權。總督則直接掌理軍事、國防、外交，且閣議通過案件，總督具否決權，因此行政大權仍多在英人手中。<sup>13</sup> 首任總理巴莫（Ba Maw, 1893-1977）組閣後，因過分維護英印人利益、處理緬印衝突失當，遭統一黨集團中人民黨黨魁吳普於 1939 年 2 月取而代之。<sup>14</sup> 次年 1 月，同屬統一黨之內政部長、1937 年曾因組閣失敗將總理職位拱手讓予巴莫的宇巴帕（U Ba Pe，生卒年不詳）陰謀倒閣，吳普得英人支持將宇巴帕解職、改組內閣，反遭宇巴帕派議員聯合開除統一黨黨籍等混亂情形，當月即由軍統局正副局長賀耀組（1889-1961）、戴笠呈報。<sup>15</sup>

翌月，上述侍從室奉蔣抄發情報將時任總理吳普所屬統一黨、人民黨以外之政黨組織評為多不足觀，並指統一黨因吳普與甫被解職之宇巴帕相互對峙，復因另一實力派吳紹脫黨組織愛國黨，統一黨勢力已漸告分化，吳普內閣行將崩潰，又歷述

<sup>12</sup> 〈侍從室侍六第 8285 號致葉楚傖函〉（1940 年 2 月 25 日），《特種檔案》，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以下簡稱黨史館）藏，特 14/8.9；〈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致王寵惠函附抄件特字第 1137 號〉（1940 年 2 月 29 日），《外交部檔案·滇緬運輸—緬甸情報》，國史館藏，020000000474A。侍從室第六組甫於 1939 年 2 月下旬成立，5 月唐縱出任組長，由侍六組綜核、協調國府一切情報組織業務。有關侍六組之組成、角色與職掌，參見張瑞德，《無聲的要角》，頁 71-136。

<sup>13</sup> “Government of Burma Act, 1935,” Myanmar Law Library, <http://www.myanmar-law-library.org/law-library/laws-and-regulations/constitutions/government-of-burma-act-1935.html>, accessed July 10, 2021; Michael W. Charney, *A History of Modern Burma*, pp. 46-51; Toe Toe Kyaw, “A Study on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Myanmar (1886-1945),” *Hinthada University Research Journal*, Vol. 5, No. 1, 2014, pp. 103-113, see especially pp. 106-107. 依據 1935 年「緬甸政府法」，內閣設部上限為 10 部。

<sup>14</sup> 陳鴻瑜，《緬甸史》，頁 138-141；U Maung Maung, *Burmese Nationalist Movements, 1940-1948*, pp. 15-18.

<sup>15</sup> 〈賀耀組、戴笠致蔣中正電〉（1940 年 1 月 21 日、26 日），《蔣中正總統文物·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〇一）》，國史館藏，002000001917A。軍統局仰光站由余素恒依其英文專長負責譯電，1941 年春因故離緬。〈戴笠致毛人鳳電〉（1941 年 3 月 1 日），《戴笠史料·戴公遺墨—人事類（第 4 卷）》，國史館藏，144000000034A。

巴莫下野後拉攏昔日反對派之德欽黨等圖組新黨等情，尚能大致掌握緬甸當局實況。該份情報接續以德欽黨聲勢浩大，認定該黨於下屆選舉勢將得勝，乃至有組閣可能等，當以聯絡德欽黨為國府未來工作方針，理由共三：其一吳普內閣行將崩潰，德欽黨因巴莫關係，在政治上必有重大發展；其二據報日方亦知德欽黨在緬頗有希望，並探知日諜國分正三曾向上級建議注意該黨活動；其三德欽黨對國府抗戰極表景仰，故而幫助國府不遺餘力，如 1939 年 10 月間毛淡棉埠武潤（Mudon）地方發生華緬衝突釀成血案，德欽黨曾派出代表與當地僑領及官方協同善後平息等。

其時德欽黨要人吳努主張親華，曾於 3 個月前、即 1939 年 12 月中旬偕扶輪社宇巴倫（U Ba Lwin, 1892-1968）、緬甸作家協會宇巴崔（U Ba Choe, 1893-1947）、女性意見領袖耶勝（Daw Mya Sein, 1904-1988）等一行，為緬甸戰後獨立地位、乃至脫離大英帝國國協之目標，爭取國府支持訪渝。<sup>16</sup> 蔣中正於日記寫下：「緬甸訪問團……來渝。有朋自遠方來，可知名聲與國勢漸著，足慰寸衷也。」<sup>17</sup> 由該情報觀之，國府此時似與德欽黨已建立相當關係，視其黨員多為大學畢業青年、知識分子，思想前進、意志堅強，且能刻苦耐勞，雖陷囹圄亦在所不惜，前途頗有希望，對德欽黨多所關注、肯定。該情報進而主張，為掌握德欽黨以分化敵人勢力，國府宜與德欽黨黨魁時相過從，灌輸三民主義，並對該黨予以經濟援助，未幾宇巴崔果有《三民主義》緬譯本問世。<sup>18</sup>

然而該情報以德欽黨聲勢高張，可能組閣，從而主張聯絡德欽黨為國府工作方針，以免失之武斷、偏頗。外交部長王寵惠於函復中央黨部徵詢對該情報意見時，即諄諄告誡：

查聯絡緬甸有力政黨以堅我國之外援自屬當前急務，但據本部所得情報，緬甸政黨向無一定之政策，亦無真正之首領。為慎重起見，我方在聯絡上似不宜稍涉偏激，致啟彼方疑竇，而供敵人宣傳之資料。近來我方在緬宣傳聯絡

<sup>16</sup> U Maung Maung, *Burmese Nationalist Movements, 1940-1948*, p. 300.

<sup>17</sup> 《蔣中正日記》，1939 年 12 月 16 日，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王世杰時任國民黨中宣部部長，於中央黨部參加招待緬甸訪華團，則感到「團中緬人尚不能予吾以特殊印象，惟團中印度某君極言亡國為奴之慘，詞長而情摯，令予感動。」參見林美莉編，《王世杰日記》，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頁 240，1939 年 12 月 14 日。

<sup>18</sup> John F. Cady, *A History of Modern Burm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418.

工作已在著著進行中，似宜由主管機關密令該項工作人員領導僑眾特加注意，詳細體察，隨機應變，庶免顧此失彼之嫌。<sup>19</sup>

事實上，約半年後、即 1940 年 9 月，吳普確如該情報預測遭到倒閣，其導火線卻是為吳普支持英國參加歐戰，巴莫、吳努及多位德欽黨領袖則因主張對歐戰維持中立、反對緬督徵兵，在當年夏天接連遭到逮捕，導致國會不信任投票，而取代吳普的並非德欽黨人，卻是已另組愛國黨的吳紹。與該情報相較，稍早由前任駐仰光代理總領事梁長培（1907-？）上呈外交部之「緬甸現狀報告」，對吳紹實力、緬華關係、中日競爭對緬策動等情，有更切實的掌握與描述。<sup>20</sup>

## 二、對親日人士之拉攏

王寵惠於 1940 年 2 月上旬核閱的這份報告，係梁長培奉調回部後，將在緬所經歷重要事件及總領事館應切實辦理事項之意見批具上呈，正文含緬甸華僑概況、抗戰後華僑救國工作概況、各團體之工作與成績、領館之工作、緬甸政治之一班、緬甸對華態度、緬文報紙、緬輿論對公路之態度、英文報紙之態度、日人在緬之活動、升格後之領館等共 11 節，全文篇幅長達 35 頁，內容可謂相當完整、全面。<sup>21</sup>依梁長培之見，英人對華一直採同情態度，英緬督府上自緬督、下至內閣各部秘書均一致援助國府，對國府之要求極願設法促成，但若有引致當地政潮可能時，則緬督等亦不願對內閣施以壓力；而內閣對國府大致尚無不利趨勢，不過為避免反對黨藉故攻擊，凡須經過閣議或國會討論之事件，則必慎重考慮，故事件之進行往往未能十分暢利。

英緬首任總理巴莫內閣時期，議員中以時為統一黨黨員的吳紹反對最烈，然而

<sup>19</sup> 〈王寵惠函復國民黨中央黨部〉（1940 年 3 月 4 日），《特種檔案》，特 14/8.9。

<sup>20</sup> 〈梁長培呈緬甸現狀報告〉（1940 年 1 月），《外交部檔案·滇緬運輸—緬甸情報》，國史館藏，020-011110-0018。梁長培（1907-？），廣東新會人，澳洲墨爾本大學畢，歷任駐澳洲總領事館副領事、駐加爾各答總領事館領事、駐仰光總領事館代理總領事、駐加爾各答總領事館總領事，後回部辦事、任情報司代科長，戰後曾出任駐緬甸國大使館一等秘書兼總領事等。專長印度、緬甸等地理文化，王寵惠評語肯定其「辦理英國遠東屬地與我國有關係事宜勝任愉快」，侍從室第三處人事評語則稱其「學能均極平庸，無政治頭腦，並以生長澳洲，對國內民情政況，毫不明瞭，惟品行尚端正……對南洋情形尚稱熟悉，對國內情形反多隔膜」。〈人事調查表〉（1940 年 3 月）、〈調查報告〉（1942 年），《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梁長培》，國史館藏，129000003183A。

<sup>21</sup> 報告正文後並附列緬甸華僑教育狀況、緬甸華僑之宣傳工作與日人在緬活動狀況、緬甸現內閣，以及附錄緬甸華商會秘書處統計報告之全緬華僑救國捐款統計表（1937 年 8 月 1 日至 1939 年 8 月 20 日止）。

繼巴莫組閣者為統一黨溫和派吳普，吳紹僅得出任農林部長，據稱係因其野心過大，且與日人過於接近，導致各方生疑。梁長培進一步指出，日人在緬活動，自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益發活躍，在日本領事館統制之下極有組織，包括成立日緬協會，名為推進商業、促進日緬文化關係，實為日人聯絡緬人之重要機關，以政黨要人為名譽會長、另由日本派遣總幹事一人執行會務，惟實際會員及緬人參加者均甚少，故工作並無重大表現。<sup>22</sup> 此外，日方尚派遣僧人赴緬與緬僧寺人員來往、招收學生赴日，並收買僑生對華僑刺探挑撥、散布謠言，利用臺灣籍民遇機生事等。宣傳方面，則由日領館運到大批宣傳圖畫、小型刊物，廣為分發，並由領館供給中日戰事新聞，拉攏報界包括津貼《新光報》編輯、資助緬人收買《太陽報》股份等，以此兩家緬報為日宣傳主力。其中吳紹身兼《太陽報》總經理暨編輯，運用該報為其口舌，與日領交往尤其密切，並曾接受日方招待於 1936 年訪問東京。<sup>23</sup>

另一方面，吳紹入閣後，與當時緬甸政壇主流意見相同，主張與國府保持聯繫。繼 1939 年底吳努訪渝，吳普、巴莫曾有聯袂訪華之說，因政局紛擾、不適遠行等因素作罷。1940 年春，長駐仰光的外交部次長曾鎔浦接獲英緬農林部通知並轉知部長王寵惠，吳紹擬於當年 5 月年假期間率隨員數人前往重慶作私人旅遊，藉以拜謁朝野領袖、參觀戰時首都。<sup>24</sup> 曾鎔浦指出，吳紹自訪日後頗有親日之嫌，上年入閣後頓時改為親華，為當時緬甸內閣最有力之部長，為人豪爽、頗具肝膽，「若能引為我用，緬甸政界當得甚大之臂助」。外交部隨即以吳紹在緬政界中地位重要，當以外賓之禮相待，經行文並召集交通部、經濟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中緬文化協會

<sup>22</sup> 1941 年 2 月出任南機關機關長之鈴木敬司係以日緬協會書記長身分及南益世化名，於 1940 年 6 至 10 月在緬活動，惟梁長培早於 1939 年下半年返國，報告所指該會總幹事並非鈴木。筆者遍尋檔案，尚未得見國府方面掌握鈴木活動之線索。秦郁彥編，《日本陸海軍總合事典》，頁 86；太田常藏，《ビルマにおける日本軍政史の研究》，頁 39。

<sup>23</sup> U Maung Maung, *Burmese Nationalist Movements, 1940-1948*, pp. 24-25. 該日領後因對運輸軍火過境事發表激烈言論，遭英政府照會日政府將其召回。值得一提的是，梁長培報告已指出「日人對緬常極力宣傳亞細亞人之亞細亞主義，直接鼓吹脫離英國統治，間接實有據為己有之野心，有智之士均能深悉，而英國政府及在緬甸之英國官吏更隨時竭力取締，及緬文報亦有喚取緬人注意日本侵略野心而須加以防範之呼聲」，亦建議「在吾人立場，應設法使其毫無活動之可能，將彼勢力完全驅出緬境」，惟稱「日人在緬活動雖非不力，收效實極有限」，似有所輕忽。

<sup>24</sup> “U Than Tin (Secret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Forests and Agriculture) to T. K. Tseng (曾鎔浦)” (April 20, 1940)、〈曾鎔浦致王寵惠函〉(1940 年 4 月 22 日)，《外交部檔案·緬甸農林部長宇素訪華》，國史館藏，02000000591A。曾鎔浦(1885-?)，福建閩侯人，南洋公學經濟科、英國劍橋大學經濟系畢，歷任國府財政部財政整理會秘書長、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鐵道部常務次長、外交部常務次長、行政院駐緬甸代表，以及駐瑞典、挪威等國公使。〈人事登記片〉(1940 年 5 月)，《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曾鎔浦》，國史館藏，129000003153A。

等會商協同辦理，擬由行政院長孔祥熙（1880-1967）及外交部等三部部長設宴招待，並安排參訪農林與工廠建設等行程。<sup>25</sup> 吳紹方面並表達此行亟欲拜見蔣中正夫婦，未料出訪前卻電稱因其妻病恙決計延期，據曾鎔浦推測吳紹也可能是聽聞日機轟炸重慶、心生膽怯之故。<sup>26</sup> 另一方面，已聯合德欽黨等新組自由集團（Freedom Bloc）的巴莫亦於此時向曾鎔浦表示擬於同年秋天訪華。<sup>27</sup>

與此同時，自中日全面開戰以來為開闢西南運輸通道，往來中南半島各地勘察布置的軍委會國研所主任王芃生，亦屢次從仰光等地呈報日人對緬活動動態。經侍從室轉呈蔣中正核閱之重要情報包括：日人策動巴莫赴日，因英緬督府拒發護照，改派同屬自由集團之宇巴印（U Ba Yin，生卒年不詳）赴日並轉往南京、泰國考察工商及統治方法，以便代日向緬人宣傳，並推銷日貨；<sup>28</sup>日駐緬新任領事訪問被監禁中之巴莫未得見，向其家人慰問並發表談話，稱世界處於新秩序下，正待日緬以平等為基礎通力合作等；<sup>29</sup>日軍於9月初續派第五縱隊百餘人，以經商為名混入緬甸，鼓吹反英等。<sup>30</sup> 10月上旬，國研所聯合緬中文化協會等緬甸親華組織、旅緬僑界等響應策動重開滇緬公路，彙呈「全緬中外人士對開路之策動與倭之阻撓」報告，王芃生並請外交部轉知國內文化界與有關國民外交團體去電響應。<sup>31</sup>

1941年春，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商震、軍令部次長林蔚（1889-1955）等所組軍事考察團為與英方研商中緬印軍事合作，曾赴緬泰邊境視察軍事連絡要地。林蔚於赴緬前，考量當前國際環境限制，預料英人非出於不得已，不肯與中方軍事互助，頗感無奈，恐「此行近於為外交策略上之一偵探哨兵而已」，仍準備對華僑說明祖

<sup>25</sup> 〈歡迎緬甸農林部長宇素〔按：即吳紹〕籌商會議紀錄〉（1940年4月30日），《外交部檔案·緬甸農林部長宇素訪華》。按中緬與緬中文化協會係中緬雙方於1939年所互設。

<sup>26</sup> 〈曾鎔浦致外交部電〉（1940年5月10日）、〈曾鎔浦致王寵惠函〉（1940年5月12日），《外交部檔案·緬甸農林部長宇素訪華》。

<sup>27</sup> 〈曾鎔浦致徐謨函〉（1940年4月29日），《外交部檔案·緬甸農林部長宇素訪華》。巴莫未幾即因反對緬督徵兵遭監禁，時任駐仰光總領事榮寶澧屢次電告外交部次長自由集團動態，包括該集團以追求緬甸民族自由解放為號召於仰光召開市民大會、集團領袖巴莫等人被捕事等。〈榮寶澧電外交部次長〉（1940年6月15日、7月27日、9月21日），《外交部檔案·滇緬運輸—緬甸情報》。

<sup>28</sup> 〈王芃生呈蔣中正〉（1940年5月27日），《蔣中正總統文物·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〇一）》。該情報有侍從室附註：「戴笠亦有同樣報告」。

<sup>29</sup> 〈王芃生呈蔣中正〉（1940年9月17日），《蔣中正總統文物·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〇一）》。

<sup>30</sup> 〈王芃生致蔣中正電〉（1940年9月20日），《蔣中正總統文物·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〇四）》，國史館藏，002000001920A。

<sup>31</sup> 有關王芃生與國研所策動滇緬路重開之相關活動，參見廖文碩，〈情報與外交：從檔案論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1937-1946）〉，頁107-108。

國抗戰情形、中英共同協力在國際人道正義等主要意義、對於世界全般戰局見解等政治宣傳材料。<sup>32</sup> 其於考察所見提要，以英軍在遠東國防程度、軍力部署及兵要地理為主，要之英軍因地廣兵單，在遠東政策上向取保守而消極疏緩，欲以羈縻之所遷就日本，儘管日軍南進之說甚囂塵上，一般認為勢須顧慮美國而不敢冒進，軍事上則維持軍官精神團結高尚、軍事切實等優點。<sup>33</sup> 華僑問題亦受到關注，商震在向蔣中正回報經過時，曾提醒：「景東〔按：即景棟（Kengtung）〕等地僑胞熱烈歡迎，惟散漫無組織，常識欠缺，國情隔膜，似應注意改進工作」，林蔚亦有華僑對於考察團頗熱烈，「可惜其舉動一切都不甚適切、不諳儀節，而黨部亦未聞有切實人員前往指導」的觀察與感想。<sup>34</sup>

4 月，中統局向中央黨部秘書處函報緬甸政治情報，亦述及該代表團訪緬受到英緬當局重視，惟因緬人迫切需求獨立，擬乘歐戰英國無暇東顧實行獨立，恐中英訂立軍事協定，國府勢力侵入緬甸，不利其獨立，故除少數親華緬人及在朝政黨外，大多數反對。尤有甚之，緬知識分子對國府國策及主義思想尚多欠瞭解，甚且以為國府有侵緬之野心。另一方面，日人密集接觸並以金錢收買德欽黨，在緬華人因該黨反英多不與之接近，致使該黨與國府及僑界感情更加隔膜。<sup>35</sup> 顯見國府各單位在爭取緬甸政黨要同時，已感受到英、緬矛盾之下，對緬人心所向難以影響乃至操作、僑務亟待整頓的焦慮。

同年 11 月下旬，緬泰邊境由軍統局進行之情報布置工作，發生該局人員遭英緬督府逮捕之短暫插曲。按軍統局前於滇緬交界地帶景棟設滇南站，計有站長鄭英有（生卒年不詳）及工作人員共 12 人，10 月間因身分暴露，正待撤退、與重慶總台通報時遭破獲，鄭等 7 人被捕，文件、密本、收發報機等全被搜獲，一併解至仰光審訊。案發後先經駐仰光總領事館副領事曾慶集（1902-1967）商請行政院駐緬代

<sup>32</sup> 〈林蔚抗戰日記〉（1941 年 2 月 3、4 日），《陳誠副總統文物·林蔚文先生抗戰日記節錄》，國史館藏，008000000616A。林蔚與考察團行經雲南時，同感當地因土地、實業等開發興盛，政治清明特別重要，認為政府應注意視各地需要，有確切之預定政治中心工作。

<sup>33</sup> 〈林蔚抗戰日記〉（1941 年 4 月 29 日、6 月 30 日），《陳誠副總統文物·林蔚文先生抗戰日記節錄》。

<sup>34</sup> 〈商震致蔣中正電〉（1941 年 3 月 12 日），《蔣中正總統文物·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〇五）》，國史館藏，002000001921A；〈林蔚抗戰日記〉（1941 年 3 月 14 日），《陳誠副總統文物·林蔚文先生抗戰日記節錄》。有關緬甸僑界自發響應抗日活動，近期朱滋源有詳細描述，參見〈中日首戰緬甸（1942 年）與華僑華人〉，頁 138-152、157-160。

<sup>35</sup> 〈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函報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1941 年 4 月 11 日），《特種檔案》，特 14/8.1。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隨後將此情報轉知外交部與王芃生。

表曾鎔浦出面，間接與英緬國防局（Burma Defence Bureau）交涉，軍統局副局長戴笠獲悉後並迅向蔣中正呈報；<sup>36</sup>駐仰光總領事館總領事榮寶澧（生卒年不詳，1939-1945 年在任）亦一再與總督府接洽，說明被捕 7 人確係中國政府所派，工作地點雖有時在緬泰邊境一帶，工作則純為偵查泰國境內中英共同敵人，即日人及漢奸之活動。12 月中旬此案由緬督特許釋放，將該 7 人減罪、曾慶集速遣回國。<sup>37</sup> 惟據榮寶澧幾度致電向外交部高層表示，緬督府對於國府隱瞞軍統局入境活動、遭國府蒙蔽情事，頗有煩言，榮寶澧對於此案可能嚴重影響中方與英緬合作，亦提出警示。<sup>38</sup>

1941 年 11 月，侍六組呈蔣中正「緬甸政黨勢力消長與我今後對策」情報一件，奉蔣批交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外交部長郭泰祺（1888-1952）：「於今後我與緬甸政府及其愛國黨聯繫一節，極希注意參考」。<sup>39</sup> 該情報含緬甸「各政黨勢力之消長」、「字素〔按：即吳紹〕赴英與我今後之對策」兩部分，對於吳紹組閣以來英緬政局之發展，頗能即時掌握。按前述吳紹自出任閣揆後，即施展鐵腕，大舉推動廉政、強化治安、緬文教育、土地及農業革新、緬人出掌政府高層、限制外人入境、與英印簽訂商約促進貿易等政策，又整肅異己、消解反對聲浪，所組愛國黨亦

<sup>36</sup> 〈蔣中正致郭泰祺快郵代電附戴笠報告抄件〉（1941 年 12 月 17 日），《外交部檔案·調查統計局工作人員在緬甸景棟被捕》，國史館藏，02000000593A。曾慶集（1902-1967），四川安岳人，曾入北平清華大學、美國陸軍士官學校、美國騎兵學校、法國巴黎大學，參加珞珈山軍訓團將官研究班、中央訓練團黨政班，歷任軍政部學兵隊中隊長、第 22 集團軍軍部高級參謀、中央軍校西北訓練班軍事總教官、軍令部高級參謀、駐仰光總領事館副領事，後出任軍令部第二廳第二處處長，綜理國外情報蒐集與研究業務，戰後任駐加拿大、美國武官、聯勤總司令部副參謀長等。《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曾慶集》，國史館藏，129000000826A。曾慶集於 1940 年依戴笠手諭與徐業道等人負責籌備各機關之防止奸諜人員訓練班，似於某種程度參與軍統局工作，由於目前資料所限，仍有待進一步深究。〈戴笠手諭〉（1940 年 3 月 25 日），《戴笠史料·戴公遺墨—訓練類（第 1 卷）》，國史館藏，144000000034A。總領事榮寶澧為軍統局人員被捕案呈報外交部時指稱，曾慶集在仰光期間，平日在外活動，諱莫如深，對於曾慶集與該案關係程度如何，亦毫無所知。「榮寶澧致外交部次長電」（1941 年 12 月 5 日），《外交部檔案·調查統計局工作人員在緬甸景棟被捕》。

<sup>37</sup> 〈外交部致軍事委員會侍從室代電轉陳蔣中正〉（1941 年 12 月 26 日），《外交部檔案·調查統計局工作人員在緬甸景棟被捕》。外交部於 12 月 19 日原擬致英國駐華大使館節略希轉電緬督府釋放，獲悉被捕人已於該月 18 日被釋放後未發。

<sup>38</sup> 〈榮寶澧致外交部次長電〉（1941 年 12 月 5 日、12 日），《外交部檔案·調查統計局工作人員在緬甸景棟被捕》。曾鎔浦不久即因病離開仰光返回昆明，戴笠致電蔣中正報稱榮寶澧因隱瞞女傭死亡、車禍肇事逃逸二案，緬督府人士對榮發生極大反感，殊不能代表政府與緬督府辦理重大交涉，建議應選派一外交較有地位與聲望之人員，赴緬接代曾鎔浦，交涉一切。〈戴笠致蔣中正電〉（1942 年），《戴笠史料·戴公遺墨—人事類（第 7 卷）》，國史館藏，144000000037A。

<sup>39</sup> 〈蔣中正致吳鐵城、郭泰祺蔣元侍六代電附發抄件情報侍六第 47897 號〉（1941 年 11 月 13 日），《特種檔案》，特 14/15.1。

隨之迅速壯大。

據該情報指出，自英緬督府通過為歐戰停止當年大選後，反對吳紹之勢力遽行低落，吳紹政權可稱極端穩固。主要在吳紹運用其政治力量，將反對派領袖相繼逮捕，導致平民黨與德欽黨合組之自由集團完全瓦解，並趁機擴展愛國黨至 6 千餘支部，吸收黨員達 20 萬人，該黨已成為緬甸首屈一指之政黨，在國會 132 票中占 72 票，尤以近日教育部長宇巴印、扶輪社宇巴倫，以及緬京青年僧人仰光醫士協會全體成員之加入，該黨勢力已臻至高峰。國內大權在握，吳紹據報業於 10 月 24 日由緬乘機赴英，並擬於會後赴美會晤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1882-1945）。該情報復稱，吳紹此行表面上在爭取自由，據悉實則與英方要求緬甸能積極應援有關，故吳紹此行與過往緬總理赴英所獲之政治地位毫無差異。

該情報總結表示，吳紹政權既已穩固，政府似應改變過去僅以英大使、緬督、國防局為交涉對象之政策，「故今後應付之方，政府除與英交涉外，應多與緬政府發生聯繫，加深經濟合作，並運用民眾力量發動國民外交，與愛國黨取得諒解」，尋求中緬雙方能在互助目標下，如何共同合作以收取實益。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簽署《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衝撞英帝國殖民利益，邱吉爾隨即於英國會宣稱印度、緬甸不適用，緬民族運動者與英帝國當局兩造歧見之緊張對立，在倫敦使館宴請吳紹的駐英大使顧維鈞（1888-1985），對緬人痛感英方對緬甸自治領地位主張模糊其詞、藉故拖延，在英人則考慮緬甸戰略地位、緬甸之於印度等英帝國其他部分以及對中國等問題之影響，亦有記述。<sup>40</sup> 對於如何確實發展對緬國民外交，國府則在 3 個月後、緬戰爆發之初，有更進一步規劃。

---

<sup>40</sup>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 5 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41。吳紹失落於無法從英國高層取得自治領地位承諾，改而與日方秘密協議允諾助日攻緬，後因消息走漏，於 1942 年 2 月遭英緬督府罷黜流放。



## 肆、對緬國民外交實施方案

1941 年間英國特勤處鎖定王芃生主持之國研所為反日策動宣傳與情報工作合作對象。1942 年 2 月前英國駐華大使卡爾（Archibald Clark Kerr, 1882-1951）於印度新德里向來訪的蔣中正建議由王芃生主持對日秘密宣傳。王芃生於 3 月中旬奉派代表蔣赴緬協助對英緬當局之聯絡合作及宣傳事宜，隨後向蔣傳達英方視雙方在緬合作為中英合作計畫之先行部分，至 4 月上旬蔣核准國研所與特勤處合作案，相關過程筆者已有討論。<sup>41</sup> 惟王芃生入緬前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副秘書長甘乃光（1897-1956）召集各有關單位詳擬之「對緬國民外交實施方案」，仍有待深入探討。

2 月中旬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之該方案問題討論會，各機關出席人員包括中統局副局長徐恩曾、國研所主任王芃生與該所駐緬研究員劉達人（1908-1988）、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處長曾虛白（1895-1994）、中緬文化協會會長杭立武（1903-1991）、前隨海外部長吳鐵城赴南洋宣慰華僑的福建省政府委員黃天爵（1903-1982）、國民外交協會委員駱介子（1902-1998）等，會中決議由劉達人彙整修正意見，經王芃生於 22 日上呈時任中執會秘書長吳鐵城之該方案，正文含對緬國民外交要領、軍政工作要領、對緬國民外交之實施共三項，並附對緬工作方案參考資料共五件，包括僑生青年之召集訓練問題、華僑團體之運用、對緬宣傳工作要領、親華緬人列表、緬政府宣傳機構負責人名表。<sup>42</sup> 該方案草就之時，日軍已兵臨仰光城下，其內容不免急就章外，該方案於商討階段即有工作性質爭議，執行之初又面臨對緬民情隔閡、各單位人事紛爭等困境，以下分別討論之。

### 一、工作性質爭議

依據該方案修正案，甲項對緬國民外交要領，明定原則共三：1. 以南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之新形勢為前提；2. 開展對緬國民外交應以軍事上之要求為準則，即以軍

<sup>41</sup> 廖文碩，〈情報與外交：從檔案論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1937-1946）〉，頁 108-110。

<sup>42</sup> 〈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函甘乃光等〉（1942 年 2 月 16 日），《特種檔案》，特 14/13.4；〈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致甘乃光等函〉（1942 年 2 月 19 日），《特種檔案》，特 14/13.3；〈王芃生呈吳鐵城〉（1942 年 2 月 20、22 日），《特種檔案》，特 14/13.6、特 14/13.7；〈商討對緬國民外交實施方案〉（1942 年 2 月 19 日），《特種檔案》，特 14/13.3；〈對緬國民外交實施方案〉（1942 年 2 月），《特種檔案》，特 14/13.9。

政工作為主，以國民外交為副，俾達中英緬協同作戰之目的；3. 同時應注意中緬基本邦交之培植及不違反盟邦英國之利益。其實施則以軍政工作為主體，密切與英軍方面取得聯繫，主動協助英軍及印緬部隊配合對緬國民外交工作，而此項工作應以緬人為主體。乙項軍政工作要領，其原則為發揮三民主義之真諦，以國外遣派軍之光榮戰績確立之，敦親睦鄰。其實施係在中國遣緬軍指揮部下設立總政治部，該案未實施前先依「出國作戰部隊黨部工作實施大綱」辦理。<sup>43</sup> 總政治部最高人選應以熟悉軍政及緬甸情形者任之，並規定政治部組織及實施辦法共 15 項，並言明總政治部聯絡工作應多採用僑生青年，由該部自身或委託訓練之。

依上述甲、乙二項指陳，該方案雖以「對緬國民外交」為名，係以軍政工作為要，國民外交次之，惟二者既於工作性質頗有落差，其工作主體與對象固亦有別：前者為軍隊之政治作戰或政治工作，後者強調國際民間交往所產生之外交意義。<sup>44</sup> 參與商討方案的國宣處處長曾虛白，即主張「此非國民外交而為配合入緬軍隊之政治工作」，並以入緬作戰為國際戰爭，故此項政治工作當增加熟稔國際情形及英印緬現狀之專家，且戰事既已在開展中，應盡量利用各機關團體目前正在緬甸工作並徵調過去曾在緬甸工作之人才，集中組織指揮，俾能迅赴事功。曾虛白並指出，入緬軍隊總指揮部下政治部之工作應分五部分，包括：1. 對部隊士兵；2. 對華僑；3. 對緬甸兵民；4. 對英印部隊；5. 對國內國際宣傳。此外，國軍作戰地區在上緬甸揮部區域，揮部半在泰國、半在緬甸，日軍利用泰兵進窺上緬，目的即在分化，國軍政工應盡量由熟悉揮部之人才出任，並動員協助推進此項政工人員與工具，如戲劇、漫畫、電影，及加強昆明中波電台對緬泰越三區之廣播節目等。<sup>45</sup>

<sup>43</sup> 該實施大綱業於 1 月下旬訂定。參見〈訂出國作戰部隊黨務實施大綱及黨部編製表預算書案〉（1942 年 1 月 27 日），《會議紀錄》，黨史館藏，會 5.3/180.2；〈出國作戰部隊黨務工作實施大綱〉（1942 年），《特種檔案》，特 14/13.8。

<sup>44</sup> 清末民初中國國民以組織形式，藉由製造輿論、抗爭、運動等手段對政府施壓，表達「公意為外交進行之立足點」，所稱「國民外交」理念，為特定時空背景下外交民主化之要求體現，於 1930 年代以降，隨著南京國民政府對內發展相對健全穩固，對外則面臨中日糾紛未決與日本侵略擴張，「國民外交」一詞逐漸轉向意指國民負有對外民眾聯絡與宣傳責任，主張國際民間交往所產生之外交意義，而此類活動又往往由政府主導、具半官方性質。參見廖敏淑，〈清末到巴黎和會時期的國民外交〉，金光耀、王建朗主編，《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頁 245-272；賈中福，〈國民外交的近代意蘊〉，《理論學刊》，總第 191 期（2010），頁 102-105。

<sup>45</sup> 〈王芄生呈吳鐵城對緬國民外交實施方案修正要點草案附修改與簽註意見〉（1942 年 2 月 20 日），《特種檔案》，特 14/13.6。國宣處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除責成溫源寧加強該處向國際間吐納總關口香港辦事處工作功能之外，並增設駱傳華主持之仰光辦事處、謝善才主持之印尼辦事處以及葉公超主持之新加坡辦事處。參見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上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頁 267。

從修正案觀之，其軍政工作要領除由軍隊內政工組織嚴格管理士兵軍風紀、肅整軍容、注意蒐集軍事諜報及防諜工作之外，仍以聯絡緬甸地方關係及促進中印緬軍隊感情為重。修正案復有丙項詳陳對緬國民外交之實施，原則共四：1. 目的在發揮動員能力以達成中英印緬軍隊協同作戰之目的，但應特別注意英緬之矛盾，依最近中印關係之新開展，著重成立所謂「中緬抗日同盟」之策略；2. 應利用緬人以緬甸人為主體之方式出之；3. 對於切實親華之工作人員應予工作生活及眷屬安全之保障，作成契約形式使其衷心服務到底；4. 充分利用社團關係（即附件所列各華僑團體），並注意各民族間各階層間之調協。<sup>46</sup>

丙項關於實施部分，言明其主體為緬中文化協會，並以前述曾訪華之宇巴倫、宇巴崔及宇巴廷（U Ba Tin, 1914-1995）三人為中心人物，由宇巴倫為領導負責組織工作，其餘二人擔任聯絡及宣傳工作。中緬文化協會補助該會經費以擴大組織加強行動，包括：1. 播音部：在昆明或臘戍（Lashio）設立中波廣播電台一所，增播緬印英華之專門節目及對敵工作日語廣播，與緬政府合作設立擾敵廣播台；2. 情報部：發布每日戰報、緬印英文書報、軍事宣傳品，津貼緬記者及報紙，並與英情報部合作之工作；3. 地區工作部：充分利用戲劇、漫畫、電影、展覽、廣播各從業員及其工具等，協助推進政工，深入民間普遍宣傳。緬中文協之外，對華僑團體則特別注意救濟及空襲服務等工作，由國民黨海外總支部及三民主義青年團等機關負責。

派軍入緬係國府部隊首次出國作戰，「對緬國民外交實施方案」以之為中心，希冀結合相關單位人員與在地資源，務實運用軍隊政工、黨務、僑界以及親華人士力量，達成中英緬協同對日作戰之目的。該方案雖一再宣稱以緬人為主體、保護親華緬人之立場，然而國府各界普遍對緬人社會文化相對陌生，甚至持有嚴重偏見，成為發展國民外交工作的首要障礙。

## 二、對緬民情隔閡

1941年中，國民黨中執會秘書長吳鐵城於中常會提交「宣慰南洋報告書」，詳陳自上年秋5個月間訪問美屬菲律賓、荷屬東印度、英屬馬來亞及緬甸各地情形，

---

<sup>46</sup>〈對緬國民外交實施方案修正案〉（1942年2月），《特種檔案》，特14/13.9。

於黨務編，指稱「緬甸黨部頗能自由活動。惟以久告停頓，基礎較弱」；於社會編，則有「緬甸民性和平，尤以撣族為甚」，其衣著式樣與漢族同、能操滇音，「足徵西邦民族文化歷史關係之深」，又「緬人習於晏安，鮮事勞動，此一則由於誤解佛理…一則由於天惠獨厚……惟緬甸婦女則以勤勞賢德著稱，家庭經濟由女負責…故緬甸婦女較為獨立自由，因有東方女權國之稱」，而「華僑在緬為數不及三十萬，故緬甸社會之中心，乃在勤苦耐勞之印人，我僑不能取得主導地位」等描述。<sup>47</sup> 與該報告書各編所載南洋其他地區相較，緬甸部分之內容頗為粗略、淺薄，其時黨政人士與緬甸關係之疏離，顯而可見。

若吳鐵城報告書對緬人評語尚稱持平，1942 年初的「對緬國民外交實施方案」則不時流露當局者歧視或漠然心態。如乙項軍政工作要領之實施部分第 11 點，稱「緬甸為女權國，女人較自由，故應嚴格管理士兵之軍風紀，以免引起惡感；而緬人平均 65% 有遺傳性性病，故應特別注意軍隊衛生；且緬人好酒好賭，均應一併注意管理」。「對緬國民外交實施方案」中的附件三，其中有一項名為「對緬宣傳工作要領」說明，文中提及對緬人弱點之分析，稱緬人教育程度低，易於輕信，且好異思遷，缺乏忍耐性，好走極端，因此亦極易利用；對緬人心理，則有「1. 緬人在觀念上對敵人之殘暴極表憤恨，而一般承認日本為侵略者；2. 但仇英觀念過深，毋寧歡迎日本打倒英國，以釋舊恨；3. 因滇緬路再開後華人購買力增強，物價高漲，影響緬人生活，在意識上難免有排華思想；4. 一部教育落後之緬人乘火打劫，掠奪華印人財產」等泛泛之談。

王芃生於 3 月銜蔣命赴緬後，對緬情之不解，亦不免遭英人嘲諷。緬督史密斯（Dorman Smith, 1899-1977）在 4 月中旬向印緬事務大臣艾莫里（Leo S. Amery, 1873-1955）報告與王芃生的初次會談過程，史密斯雖讚許王芃生給予他及內閣閣員們深刻印象，其談話令人欽佩、信服，然而「他對緬甸政治的無知與他對緬甸政治的學習欲望差堪比擬」。<sup>48</sup> 國府人員對緬民情之隔閡，隨即又因機構與人事紛爭，使相

<sup>47</sup> 〈宣慰南洋報告書〉（1941 年 5 月），《國民政府檔案·宣慰南洋報告書》，國史館藏，001000005473A。

<sup>48</sup> “Reginald Dorman-Smith to Leo S. Amery repeated to Viceroy and Chungking” (April 14, 1942), Political Situation in Free China, Records of Foreign Offic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 K., Kew, FO 371/31644. 王芃生赴緬係偕軍事委員會參議余兆麒（S. K. Yee）與英國經濟作戰部與新聞部合聘駐華幹員 J. T. Galvin 同行，Galvin 係以反日宣傳專家與顧問角色隨行，同年於國研所為與英國特勤處合作成立之顧問室（英方稱為資源調查所，Resources Investigation Institute）出任顧問。參見“Horace James Seymour to Reginald

關工作雪上加霜。

### 三、機構與人事紛爭

上述「對緬國民外交實施方案」之附件三對緬宣傳工作要領，檢討過去宣傳之弱點，包括：1. 機關不統一，無正確綱領；2. 多注意英文宣傳，輕視緬文宣傳；3. 對新聞界之津貼未適當分配；4. 未充分利用緬甸宣傳之宣傳工具，如廣播在緬最普遍之歌劇等；5. 尚未設立一緬文機關報或雜誌。有關最末項，當年2月上旬，國民黨海外部因應局勢，資助仰光黨報《覺民日報》搬遷機器、轉移員工，同月中旬周寒梅（1905-？）致電部長劉維熾（1892-1955）轉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稱該報初至八莫（Bhamo），現擬至臘戍發行緬文版，函請核辦。<sup>49</sup> 3月中下旬，周寒梅三度致電吳鐵城，稱辦理緬文報計畫已得當地政府及緬甸各方協助，並商定在緬京（Yangon）或眉苗（Maymyo or Pyin Oo Lwin）發行，電訊、機器、人力等能由當地政府提供或介紹租借。經費則需開辦費緬幣1萬盾，每月經常費約4千盾，請中央照撥。又海外部原擬發行黨報聯合版，經吳鐵城指示應集中財力籌辦緬文報，聯合版事遂告作罷。<sup>50</sup>

至4月中旬，周寒梅再致函吳鐵城表示，關於辦緬文報，因各方意見紛歧，決請原於仰光辦理《仰光日報》的廖崇聖設法實現，並積極進行中，又同月上旬，蔣中正來臘戍已批准王芃生與緬督商洽成立之反侵略戰爭協會，其事業費緬幣15萬盾，係由滇緬公路督辦公署督辦兼南洋戰區疏散協助委員會主委曾養甫（1898-1969）督辦，王芃生負責。吳鐵城批示以中央撥付《覺民日報》遷移費5千盾，然緬文報由反侵略會辦為宜，亦或仍照原議由《覺民日報》出版緬文版，經費糾紛由黃天爵解決等，辦緬文報事仍懸而未決。<sup>51</sup> 未料吳鐵城批示次日，原任海外部第二

---

Dorman-Smith" (March 16, 1942), Political Situation in Free China, FO 371/31644. 原文為："His ignorance of Burmese politics only equated his desire to learn about them."

<sup>49</sup> 〈李樸生致吳鐵城、劉維熾電〉（1942年2月7日），《特種檔案》，特14/5.11；〈周寒梅電劉維熾轉吳鐵城〉（1942年2月7日），《特種檔案》，特14/5.11。周寒梅原任中宣部科長，赴緬前於吉隆坡、新加坡等地辦理黨報。

<sup>50</sup> 〈周寒梅致吳鐵城電〉（1942年3月19日、26日、31日），《特種檔案》，特14/5.4、特14/5.16、特14/5.5。

<sup>51</sup> 〈周寒梅致吳鐵城函〉（1942年4月14日）、〈吳鐵城批示〉（1942年4月16日），《特種檔案》，特14/5.3。又王芃生與緬督商議並向蔣回報事，詳〈王芃生電蔣中正〉（1941年3月26日），《蔣中正總統文物·遠征入緬（二）》，國史館藏，002000002115A。廖崇聖（1907-？），廣東番禺人，廣州嶺南大學經濟系畢，歷任嶺南大學商學院教授、廣西省經濟委員會專門委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閩

處處長、時任緬甸戰區華僑疏散委員會組訓組主任李樸生（1896-1986）即致函吳鐵城，舉報接獲指控周寒梅在臘戍領取補助費、報銷損失，卻在曼德勒（Mandalay）販賣布匹雜貨，從事投機營業，置宣傳工作於不顧。<sup>52</sup> 3 日後，李樸生再去函吳鐵城，稱關於辦理緬文報刊事，現無此需要，周寒梅英文不通，緬語亦非所能，請反侵略會研究，但王芃生以為種種問題均難解決，只願出錢不願負責。吳鐵城最終只得批示辦緬文報事緩辦，周寒梅工作請海外部酌定。<sup>53</sup>

國府為改善過去宣傳之弱點，於仰光總領事館與國民黨駐緬總支部撤退後，嘗試於臘戍辦理緬文報，立意良善，惜所任非人，又缺乏相關語言人才，原由海外部人員承辦，後推交反侵略戰爭協會辦理未果，只得草草作罷。而王芃生赴緬會見英緬督府高層商談合作期間，由中統局副局長徐恩曾出面，於重慶與英緬督府國防局中國部主任魯賓生（I. E. Robinson，生卒年不詳）商定戰時合作辦法，復發生與海外部工作範圍重疊情形，以下詳論之。

## 伍、緬戰期間與英緬督府之合作

### 一、中統局與英緬督府國防局之合作

1942 年 3 月下旬，王芃生呈報蔣中正與緬督洽商結論，英緬方面同意組織民眾及憲警合作，但主張需適應各地情形需要，包括在曼德勒密組中緬憲警合作機關偵緝奸細，保護滇緬路交通安全，以及在淪陷區與泰國加強情報合作等。在時任英緬總理保頓（Paw Tun, 1883-1953）等官員參與支持下，王芃生向蔣建請軍統局書記長兼軍令部第二廳副廳長鄭介民（1897-1959）速來共同主持工作事宜。<sup>54</sup> 4 月上旬，

---

粵宣傳專員辦事處設計委員、國民黨駐緬總支部執行委員、緬甸《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等，戰後於加爾各答任《印度日報》社長，因反共立場，於 1954 年被印度政府限令離境。《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廖崇聖》，國史館藏，129000026725A。

<sup>52</sup> 〈李樸生致吳鐵城函〉（1942 年 4 月 17 日），《特種檔案》，特 14/5.6。

<sup>53</sup> 〈李樸生致吳鐵城函〉（1942 年 4 月 20 日）、〈吳鐵城批示〉（1942 年 4 月 26 日），《特種檔案》，特 14/5.6。周寒梅日後曾致函吳鐵城辯解，稱以補助費為七七宣誓獻機捐款有他人為證，遭到轟炸致報紙油墨損失等也有總領事能證明，遭受損失亦為不可抗力損害。〈周寒梅致吳鐵城函〉（1942 年 7 月 11 日），《特種檔案》，特 14/1.18。

<sup>54</sup> 〈王芃生致蔣中正電〉（1942 年 3 月 26 日），《蔣中正總統文物·遠征入緬（二）》。同年 5 月下旬，

蔣中正再親赴緬甸前線，於眉苗與緬督談話，雙方會談的一個重點係為取締緬境中國共黨活動事宜。依據中方紀錄，緬督以中共黨人在曼德勒大事活動宣傳，在緬人間調中國士兵汙辱緬甸婦女及作其他種種不規則行為，雖其中有部分或已被緬督府逮捕甚至失蹤，然自由活動者數量仍多。緬督為此大感煩擾，並以中國共黨之活動，必須中國人辦理之方能有效。蔣表示中共黨人亦在當地宣傳中國人不需為英人利益犧牲生命，擾亂國府軍隊，同意考慮多派警察及特務人員。<sup>55</sup>

與此同時，英緬國防局代表魯賓生為要求合作已到訪重慶，就中方選派幹員入緬事，與中統局徐恩曾面商合作辦法。<sup>56</sup> 按英緬國防局係直屬緬督之情報機構，1937年印緬分治時成立，前身為英印督府犯罪調查部轄下之特別情報局（Special Intelligence Bureau of the Criminal Intelligence Department），係1930年代英國統治者為壓制緬甸境內民族獨立運動、緬甸共產黨等反抗勢力，維護帝國安全穩定而設。英緬國防局專司情報蒐集與利用，協助直隸緬督之國防部相關工作。<sup>57</sup> 徐恩曾於4月中旬向吳鐵城呈報與魯賓生商談結果，擬由中統局選派大量幹部入緬，為提高工作，盡量發揮效用，除已在緬工作人員，擬再遴選幹員10餘人，故請中央酌予補助，俾利工作進行。吳鐵城函復稱蔣中正已批准合作辦法，關於補助事可專案簽呈，另應與海外部駐緬辦事處密切聯繫，工作範圍不可重複。<sup>58</sup>

按海外部駐緬辦事處之設立，係該部為因應太平洋戰事擴大、緬甸情勢嚴重，厲行分區輔導制，派劉翼凌（1903-1994）為駐緬總支部書記長，譚永生（生卒年不詳）前往臘戍、陳洪海（1913-？）赴仰光及曼德勒協助宣傳等，復組設駐緬臨時辦

---

戴笠曾下手令指鄭介民帶回與英國遠東情報主任洽商之經過，其中英方要求供給之件當酌量給予，應簽請蔣中正准商軍令部辦理。〈戴笠手令〉（1942年5月25日），《戴笠史料·戴公遺墨—組織類（第1卷）》，國史館藏，144-010105-0001-006。

<sup>55</sup> 〈蔣中正與緬甸總督談話紀錄〉（1942年4月6日），《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遠征軍入緬（一）》，國史館藏，002000000373A。

<sup>56</sup> “I. E. Robinson to Konrad Hsu（徐恩曾）”（April 2, 1942）、〈緬甸國防局中國部主任魯賓生節略〉（1942年4月2日），《特種檔案》，特14/6.3.1。魯賓生訪問重慶期間下榻嘉陵賓館，臨行前致函感謝徐恩曾接待，並表示原則同意雙方合作辦法草案。

<sup>57</sup> E. B. Clipson, “Constructing an Intelligence 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onial Security Services in Burma, 1930-1942” (PhD diss., University of Exeter, Exeter, U. K., 2010), pp. 127-129. 依據前述1935年「緬甸政府法」，軍事、國防、外交係總督職權，非內閣權限，國防部首長為Counsellor，而非Minister，直接向總督負責。

<sup>58</sup> 〈徐恩曾致吳鐵城函〉（1942年4月11日）、〈吳鐵城函徐恩曾〉（1942年4月16日），《特種檔案》，特14/6.3。

事處，以期增強領導緬僑，致力戰時工作，並劃分區域，每一黨區派輔導員一人前往指導各該區黨務工作，又奉飭派員參加由滇緬鐵路督辦曾養甫領導之南洋戰區疏散協助委員會，辦理疏散僑民、保衛地方，徵求國軍翻譯嚮導人員、組織青年戰地服務團等。<sup>59</sup> 上述由蔣中正核定、徐恩曾出面洽訂之該項合作辦法，正式名稱為「中國海外部駐緬辦事處、緬甸國防局戰時合作辦法」(Plan of Cooperation,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War, between the Burma Defence Bureau and the Burma Office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Overseas)，同年 9 月、12 月復由中統局與緬方二度修訂，維持雙方合作關係，總負責人為中統局羅劍雄(1914-?)。<sup>60</sup> 海外部駐緬辦事處似僅為名義上之合作單位，並提供部分人力支援，中統局為實際主導者。

比較該合作辦法於緬戰期間與緬甸陷日後之修訂內容差異，主要於工作重點上，前者係針對緬甸境內第五縱隊之宣傳與顛覆活動，進行情報蒐集與偵防，於各地預先布建情報網，並加強華僑組訓以服務中國軍隊；後者則注重偵查全緬敵偽之各項設施活動情形，加緊同盟國對緬甸關切有利之宣傳工作，密派幹員深入緬境內地從事組訓華僑與緬民共起反敵，積極進行破壞敵人之軍事政治經濟一切設施，作同盟軍反攻時之響應，並加強潛伏工作，以奪取物資而破壞敵人以戰養戰之陰謀。後者並有在滇緬邊境訓練緬甸華僑，以便派遣入緬境內工作，訓練計畫另定之條目，另增列雙方遇必要時，可隨時商得同意修改，於某方向對方提出正式通知時即行終止。

該合作辦法各版本於界定雙方合作關係與工作範圍上則大致相同，包括七項：

1. 雙方所得各種情報應於最短時間內全部交換；
2. 對敵偽分子應採之秘密制裁行為，由辦事處國防局雙方合作處理之；
3. 國防局如需要工作人員，可請辦事處負責

<sup>59</sup> 〈五屆十中全會中央海外部工作報告〉，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海外黨務工作》（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8），頁 330。劉翼凌（1903-1994），廣東梅縣人，上海復旦大學心理學系肄業，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一期畢業。歷任中央警官學校講師、中央海外部第一處事務科科長、駐緬甸總支部書記長、國民外交協會仰光辦事處代表、中央海外部駐緬辦事處副主任等，戰後轉往宗教界。人事調查報告指其曾參加共黨，後與共黨絕緣，做官思想甚為濃厚，惟對金錢觀念甚為恬淡，擅於文字，事務非其所長。《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劉翼凌》，國史館藏，129000000217A。

<sup>60</sup> “Plan of Cooperation” (April 1942)，〈緬甸國防局中國部主任魯賓生節略〉，《特種檔案》，特 14/6.3.1；〈中國海外部駐緬辦事處、緬甸國防局戰時合作辦法〉（1942 年 12 月），《特種檔案》，特 14/16.12。羅劍雄（1914-?），廣東順德人，隨父輩移居馬來亞，於檳城經商。後回國加入復興社，歷任中央軍校教導隊教官、馬來華僑回國青年服務團團長、軍委會戰幹一團少校、中統局調查員等，長於馬來半島方言、海外宣傳及僑務工作。〈人事登記片〉（1942 年 6 月 27 日），《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羅劍雄》，國史館藏，129000004977A。



介紹其生活費工作費及需用器材，由國防局擔負；4. 辦事處工作人員如需要交通及行動之便利，國防局應盡力協助；5. 雙方應加強宣傳機構，俾得充分利用；6. 為便利傳遞消息，雙方應協力組織全緬之交通網，設置電台及傳訊交通工具以收時效；7. 為便利合作起見，雙方互聘顧問一人，擔任聯絡及隨時商洽事項。至 1943 年中統局與英緬國防局仍維持合作關係。<sup>61</sup>

## 二、王芃生建議中英合作反日宣傳受阻

王芃生入緬後相關活動，受到英帝國高層重視，1942 年 4 月即由緬督經上級印緬事務大臣向首相呈報，其中王芃生對於雙方在緬反日宣傳之內容主軸與合作提議，最受矚目。英人著眼於緬甸戰略位置，一方面為盟軍協同作戰，尋求與國府宣傳合作之可行性；一方面為英國在緬利益與戰後地位，中央政府與地方督府、中央各部會間於對華合作又有不同考量，復隨緬戰情勢演變而調整策略，以下詳論之。

### （一）王芃生之宣傳提議

1942 年 4 月底，印緬事務大臣艾莫里向首相邱吉爾呈交備忘錄詳陳，依據緬督史密斯報告，王芃生以蔣中正個人代表身分入緬，以中國軍隊士氣與政治作戰為職責，因而自然關注在緬反日宣傳問題，目前已完成若干工作，包括會見英緬閣員、成立反侵略戰爭協會，以及對引導在緬宣傳提出數項具深遠意義之計畫。著眼於中國人是英緬進行反日宣傳不可或缺的最佳代理人，史密斯對王的上述活動均已同意並表示歡迎。王芃生所提議之在緬宣傳主軸，顯為「聯合國家在亞洲致力於對抗獨裁與侵略，為爭取自由與民主而奮鬥」。中國由於其經驗，最適合將此訊息帶入緬甸。王芃生坦白指出，對部分緬人來說，宣傳若要成功，其內容不能僅僅是對英人有利的；例如許多傾向共產主義的德欽黨人，因反對英國而投入日本陣營，然而此非自然的結盟，且緬人之經濟困頓，在日本統治下是不可能有所改變的。<sup>62</sup>

對此艾莫里與史密斯持相同看法，認為從長遠來說，中國人行動的可能發展必

<sup>61</sup> 馬振犢、邱錦合撰之〈抗戰時期國民黨中統特工的對英合作〉一文，對中統局與英緬國防局達成協議後，於 1943 年間派李竹瞻、陳蔚如負責該區活動，用人不當、成員素質不佳等情形，有所描述，詳頁 170-175。

<sup>62</sup> “Leo S. Amery’s Minute to Winston Churchill” (April 30, 1942), Political Warfare in the Far East, Records of Foreign Offic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 K., Kew, FO 371/31787. 原文為：“the United Nations are engaged in a struggle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in Asia against dictatorship and aggression.”

將對英人形成風險，但這些風險本身並不足畏，相較於英人對反日宣傳的急迫需要，實可謂微不足道。艾莫里接著談到，王芃生建議邱吉爾公開聲明，將日據下緬甸人的命運與英人所宣告的戰後政策相對比，並使中國人能以緬甸的最終自由為目的，與英國人並肩作戰。王並未明白建議英人推進對緬政策，而毋寧希望英人強調其對緬之規畫設計與日據緬甸的明顯差異。艾莫里因此建議邱吉爾致電蔣中正，並依上述宣傳內容主軸檢陳草擬聲明稿；依艾之見，首相之公開聲明除能有效促進雙方當前合作，尚得藉此防範英人未來之可能風險。<sup>63</sup>

該聲明稿首段即向與英印緬軍隊為保衛緬甸已共同作戰 2 個月之中國軍隊致上敬意，中國對日本侵略者的長期戰鬥，目前已成為世界性衝突的一部分，中國、大英國協以及其他聯合國家在亞洲為保存民主自由而戰，並不下於歐洲。亞洲其他國家未能如中國，對於在這場衝突中已處於岌岌可危之境地有著明確認識，基於「朝鮮與中國滿洲及其他日占區現況」，<sup>64</sup>已充分說明日本作為侵略者與其獨裁本質，即便緬甸被賦予名義上之獨立，也將如滿洲國般成為傀儡政府。反之大英國協植基於民主化自治政府原則，該項原則已通過內閣治理部分地賦予緬人，在對日作戰勝利後，將獲得徹底實踐。<sup>65</sup> 聲明稿經邱吉爾批交其左右手外交部部長艾登（Anthony Eden, 1897-1977）、新聞部部長布列肯（Brendan Bracken, 1901-1958）徵詢意見，初步認可王芃生所提議之宣傳合作計畫。<sup>66</sup>

## （二）英國政府的各方考慮

然而 5 月上旬以來盟軍於緬戰迅速潰敗，中國遠征軍部分退往邊界，孫立人（1900-1990）師與英軍向印度撤退，上述聲明稿內容亦隨之失去時效。印緬事務大臣艾莫里奉飭修訂，儘管於彙報中向邱吉爾極力重申對緬宣傳的急迫性，並支持王

<sup>63</sup> “John M. Martin, Principal Private Secretary to Winston Churchill, to Valentine G. Lawford, Assistant Private Secretary to Anthony Eden” (May 12, 1942), Political Warfare in the Far East, Records of Foreign Office, FO 371/31787.

<sup>64</sup> 原稿為「朝鮮、滿洲及中國其他日占區」，經英國外交部建議修改，以避免誤會朝鮮為中國的一部分。 “Lawford to Martin” (May 6, 1942), Political Warfare in the Far East, Records of Foreign Office, FO 371/31787.

<sup>65</sup> “Draft telegram from Prime Minister to General Chiang Kai-shek containing text of proposed message for publication” (April 30, 1942), Political Warfare in the Far East, Records of Foreign Office, FO 371/31787.

<sup>66</sup> “Martin to Lawford” (May 12, 1942), Political Warfare in the Far East, Records of Foreign Office, FO 371/31787.

芃生的宣傳提議要旨，<sup>67</sup>邱吉爾已有不同思考。英國政府最終決定擱置王芃生的合作提案，主要原因包括：

1. 非正常外交管道：邱吉爾於5月中旬回覆艾莫里表示，該合作提案最好仍依通常程序由外交部辦理。邱吉爾認為，他對蔣中正的可能影響力，寧願施用在更大、更重要的議題上。<sup>68</sup>次日，緬甸部知會外交部，有關王芃生合作提案，現擬改由英國駐華大使薛穆（Horace Seymour, 1885-1978）致電中國外交部長，檢附之聲明稿則以個人信形式，由艾登代表英國政府署名。與原提案相較，層級已大幅降低。<sup>69</sup>6月上旬，艾登先是約見中國駐英大使顧維鈞，委請代向蔣中正轉達英對遠東戰線並無輕視之意，今後對反攻緬甸問題希能早由英、美、華三方會商統籌辦法收復等；<sup>70</sup>復致電薛穆委請其就王芃生之宣傳提議要旨與合作方式，向國府進行疏通、瞭解。艾登亦表示，在當時情勢下，國府基於諸多理由未必會支持英方。<sup>71</sup>中英立場與利益之相互矛盾，因以下二點愈形突顯。

2. 對國府宣傳策略之評價：太平洋戰爭爆發初期，英軍在東南亞一敗塗地，中國以國軍不曾投降而民族主義情緒高張，政界和輿論紛起鼓吹中華民族不能對弱小民族前途置身事外，英國官方尤難消受西方媒體對中國戰事前景樂觀態度。<sup>72</sup>與英外部調整王芃生所提合作方案同時，盟軍東南亞戰區司令部政治顧問德寧（M. E. Dening, 1897-1977）向外部呈報意見，扼要指出此刻國府對外宣傳當務之急，在因應日本以亞洲真正的解放者自居，以及對國府使東方民族自甘作帝國主義馬前卒的指控，故而有必要傳達所具純粹的亞洲觀點，不論係原意或權宜之計，務須提出亞

<sup>67</sup> “Amery’s Minute to Churchill” (May 18, 1942), Political Warfare in the Far East, Records of Foreign Offic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 K., Kew, FO 371/31788. 原文為：“...it seems to me that the substance of General Wang’s proposals is still to be welcomed.”

<sup>68</sup> “Churchill to Amery” (May 19, 1942), Political Warfare in the Far East, Records of Foreign Office, FO 371/31788. 原文為：“I would rather keep any influence I may have with him for some larger matter.”

<sup>69</sup> “John Walton, Deputy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 Burma, to Lawford” (May 20, 1942), Political Warfare in the Far East, Records of Foreign Office, FO 371/31788. 其時外交部長宋子文長期滯美，蔣中正以行政院長身分兼理外交部，兼理時期為1941年12月27日至1942年10月30日。參見張朋園、沈懷玉編輯，《國民政府職官年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頁102。

<sup>70</sup> 〈顧維鈞致蔣中正電〉（1942年6月1日），《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重要協商（一）》，國史館藏，002000000370A。

<sup>71</sup> “Eden to Seymour” (June 4, 1942), Political Warfare in the Far East, Records of Foreign Office, FO 371/31788.

<sup>72</sup> 1942年春，艾登與薛穆曾就此頻繁交換意見。參見廖文碩，〈邁向亞洲大國〉，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第五編：對外關係》（臺北：國史館，2015），頁298-299。

洲人「當下即刻無條件自由」之政策主張，與國府其時為比照《大西洋憲章》、強烈要求制訂一《太平洋憲章》（*Pacific Charter*）若合符節。如此王芃生原案對緬人戰後自由之承諾顯得過度遙遠，而中英雙方不睦氛圍，亦使國府恐難接受合作。<sup>73</sup>

3. 對國府有領土野心之疑忌：前述艾莫里於 4、5 月二度呈邱吉爾所附草擬電文稿，以及艾登於 6 月上旬致薛穆電文，均援引王芃生一再強調，中國人對緬人的同情因一眾所周知之事實而強化，那就是「中國與日本不同，中國既無領土野心，也無意干涉緬甸事務」。<sup>74</sup> 然而 1942 年年中以前國府的諸多作為，卻使英方對國府欲干涉英帝國內政的顧慮，顯非空穴來風：無論是蔣中正於 2 月訪問印、緬，為同情印度以國大黨為首之民族運動，亟欲插手調停英印政爭；王芃生於 4 月在曼德勒中央監獄會見遭英緬督府監禁之原為德欽黨中堅、後成為緬甸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Burma）領袖德欽梭（Thakin Soe, 1906-1989）、德欽巴罕（Thakin Ba Hein, 1917-1946）、德欽覺盛（Thakin Kyaw Sein，生卒年不詳），達成協議倘如邱吉爾及英緬督府允諾緬甸戰後自治領地位，三人願放棄所有反英行動；<sup>75</sup>或是吳鐵城於同月公開宣稱緬甸戰後獨立等言論，以致美、英普遍有「中國人傾向認為中國將成為亞洲民族領導者」的觀察。<sup>76</sup>

9 月下旬，王芃生透過薛穆及國研所顧問室英籍顧問安獻今（G. Findlay Andrew, 1887-1971），向英緬督府表示，希望英方能將兩名在印度監禁之德欽黨人釋放，由

<sup>73</sup> “Denying on General Wang’s Proposal for Propaganda Concerning the Burmese” (May 26, 1942), Political Warfare in the Far East, Records of Foreign Office, FO 371/31788. 1942 年 3 月，蔣中正於訪印後曾思考預備一《太平洋大憲章》，以為「凡亞洲各民族應予獨立平等之宣言」，經國防最高委員會王寵惠等人研究，僅主張補充《大西洋憲章》聯合宣言，然而美、英媒體此前已將立法院院長孫科等人之相關言論大肆報導。參見廖文碩，〈邁向亞洲大國〉，頁 288-289。

<sup>74</sup> “Leo S. Amery’s Minute to Winston Churchill” (April 30, 1942), Political Warfare in the Far East, Records of Foreign Office, FO 371/31787; “Amery’s Minute to Churchill” (May 18, 1942), “Eden to Seymour” (June 4, 1942), Political Warfare in the Far East, Records of Foreign Office, FO 371/31788. 原文為：“China, unlike Japan, has no territorial ambition nor any desire to interfere in Burmese affairs.”

<sup>75</sup> “Seymour to Dormon-Smith with A Copy of Aide-Memoire by G. Findley Andrew Dated Sept. 29, 1942” (Oct. 3, 1942), Co-operation with the Chinese, Records of Foreign Offic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 K., FO 371/31633. 三人之中德欽梭與德欽覺盛名列緬甸「三十志士」，即 1940-1942 年間以翁山等人為首之緬獨運動人士，陸續偷渡離緬赴日本占領下海南島、臺灣等地接受軍事訓練，配合日軍入侵進行武裝起義反英行動。參見蕭明禮、朱滋源，〈日本侵緬之戰（1940-42）與臺灣的角色〉，頁 1-40。

<sup>76</sup> 廖文碩，〈邁向亞洲大國〉，頁 299。林孝庭指出，戰時中英兩國在印度、西藏和南亞次大陸等問題上，因自身利益導致雙方互信關係消蝕。參見林孝庭，〈二戰時期中英關係再探討：以南亞問題為中心〉，《近代史研究》，第 4 期（2005），頁 32-56；Hsiao-ting Lin,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 (Vancouver: UBC Press, 2006).

其帶回重慶。王向安獻今指稱，若是緬戰之初英方能聽從其建議釋放巴莫，便不致發生巴莫逃獄、後轉而出任日本傀儡政權之緬甸行政府長官，對英方不啻為一場政治災難。王並強調，國府尋求與英方協同作戰、確保雙方共同利益，於緬甸及馬來亞僅要求華僑能得到平等對待。另一方面，王雖未向薛穆提出如上述有關緬甸戰後自治領地位之要求，薛穆則向其主動明白指出緬甸的未來係屬高層政策問題，實非現階段能夠底定。<sup>77</sup> 薛穆、史密斯、緬甸部等雖著眼於王芃生向來之誠意與密切合作，原則同意其接回緬人之提議，惟對於國府可能就此發動之宣傳攻勢感到憂心；<sup>78</sup> 英外部如遠東司（Far Eastern Department）司長克拉克（Ashley Clarke, 1903-1994）特別指示薛穆等人「應盡可能阻撓中國人出自精心盤算終止英國聯繫的宣傳」。<sup>79</sup>

## 陸、結論

緬甸戰事結束後，軍委會參謀團團長、甫出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的林蔚，遵蔣中正命呈報在緬甸戰役作戰經過及失敗原因與各部優劣評判報告書，將戰時盟軍交通、通信受阻、緬民暴動或參加日軍作戰等情形，歸因於日人所從事政治工作，得以於盟軍後方形成大規模組織及發縱指使，尤其利用德欽黨人，無孔不入，切實配合日軍作戰行動。林蔚反思檢討國府政治工作，則嚴厲批評其未見成效，包括：迄至戰敗，所有中央駐緬境各黨政機關未能統一，遠征軍總政治部亦未正式成立；華僑雖眾，但多年來未曾注意如何準備用以幫助軍事，臨時組織，已嫌太晚，反滋生事端；軍隊政工人員僅隨軍隊所到之處活動，在局部範圍內慰問緬民為主，收效不宏；而緬戰期間王芃生奉派到緬，卻僅與緬甸政府中人及緬北各土司有數度接洽，

<sup>77</sup> "Seymour to Dorman-Smith with A Copy of Aide-Memoire by G. Findley Andrew Dated Sept. 29, 1942" (Oct. 3, 1942), Co-operation with the Chinese, Records of Foreign Offic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 K., Kew, FO 371/31633. 安獻今係二戰時期英國特勤處在華負責人，有關安與王芃生之接觸與合作關係，參見廖文碩，〈情報與外交：從檔案論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1937-1946）〉，頁110-113。

<sup>78</sup> "Seymour to Dorman-Smith" (Oct. 3, 1942), Co-operation with the Chinese, Records of Foreign Office, FO 371/31633; "W. Johnston to Ashley Clarke" (Dec. 1, 1942), Political Warfare in the Far East, Records of Foreign Offic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 K., Kew, FO 371/31794.

<sup>79</sup> "Clarke to Seymour" (Nov. 9, 1942), Political Warfare in the Far East, Records of Foreign Office, FO 371/31794. 原文為："...should do your best to discourage Chinese propaganda based on the contemplated ending of the British connection."

並發出一種反侵略宣言，此外並無何種實際行動可言，惟既未能以組織集中力量，以其一人，亦僅能做到如此程度而已。林蔚並歸結國府因對英國盟友關係，不能宣傳解放緬甸，日軍則可以謬言扶助緬人獨立，以博取緬人歡心，因之宣傳工作，能先勝一籌。<sup>80</sup> 林蔚對王芃生赴緬活動觀察，顯然因視野所及，未得全貌，然所言亦未遠矣，對於國府政治工作諸項缺失致失宣傳先機之利，實一語中的。

戰時國民政府中央情報機構對英緬政治活動，因滇緬路開通而起，隨日軍南進攻勢擴大而強化。1942 年緬戰前夕，由侍六組整理之二份關鍵報告，顯示國府主要情報機構軍統局、中統局、國研所皆派員進駐，進行情蒐、對緬策動與反日宣傳工作，對緬甸政情之認識，從武斷偏頗至漸能即時掌握，對促成日軍成立南機關之海軍大尉國分正三等諜報活動亦有所關注，並積極主張與緬甸主要政黨及親日人士之聯絡。國民黨黨務工作由海外部透過駐緬總支部與臨時辦事處進行，並協助僑務與國民外交工作。外交系統則主要透過甫升格之駐仰光總領事館與常務次長、後奉派行政院駐緬代表曾鎔浦長駐仰光，掌握緬情與辦理對緬事務。

國府各系統各行其是、相互競合，亦致矛盾叢生：情報體系介入外交主管機關權責，時任外交部長王寵惠提出告誡；駐仰光總領事榮寶澧指軍統局密派入緬活動人員被捕，嚴重影響中英邦交，戴笠則致電蔣中正指責榮對英緬交涉不力；國民黨中央黨部召集擬訂之「對緬國民外交實施方案」，因民情隔膜、機構與人事紛爭成效有限；而如王芃生在 1942 年與英緬督府至英帝國內閣之宣傳合作交涉，則完全脫離外交程序，甚至並未事事向蔣中正呈報。日本占緬後，由中統局主管與英緬國防局之情報合作；1943 年中，蔣下令國府與英、美在南洋軍事情報合作概交軍統局辦理；至 1944 年初，徐恩曾聯絡鄭介民移交與英緬合作事，戴笠確有切實掌控、統一指揮，以便對付英方之意。<sup>81</sup>

英人治下，緬甸自 1937 年起獲得有限之自治權，緬人民族運動持續風起雲湧，國府對德欽黨人士尤其關注，先有吳努等一行訪渝謁蔣，隨之有緬文版《三民主義》問世；首任總理巴莫下野後，聯合德欽黨成立自由集團、改採親華路線，透過曾鎔

<sup>80</sup> 〈林蔚呈緬甸戰役作戰經過及失敗原因與各部優劣評判報告書第三冊〉（1942 年 9 月 30 日），《國民政府檔案·緬甸戰役得失評判（四）》，國史館藏，001000005729A。

<sup>81</sup> 〈戴笠致鄭介民電〉（1944 年 1 月 20 日），《戴笠史料·戴公遺墨—政治類（第 2 卷）》，國史館藏，144000000002A。

浦與國府展開聯繫；緬戰期間至緬甸陷日後，王芃生復二度試圖透過與英方談判協議，期望英緬督府能釋放遭監禁之德欽黨左傾人士。然而國府於 1942 年緬甸戰役前後，對緬、對印戰後地位之設想與嘗試干涉，無論是否如英人所指稱，係基於反制日本大東亞共榮宣傳之權宜，抑或感於戰爭前景光明，亟欲為提升中國國際地位與領導亞洲事務積極表態，迅即招致為重返亞洲布局之英國疑忌與防範，為雙方日後關係蒙上深重陰影。<sup>141</sup>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

#### (一) 中文

- 《外交部檔案·滇緬運輸—緬甸情報》，臺北：國史館藏，020000000474A。
- 《外交部檔案·緬甸農林部長宇素訪華》，臺北：國史館藏，020000000591A。
- 《外交部檔案·調查統計局工作人員在緬甸景棟被捕》，臺北：國史館藏，020000000593A。
- 《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梁長培》，臺北：國史館藏，129000003183A。
- 《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曾慶集》，臺北：國史館藏，129000000826A。
- 《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曾鎔浦》，臺北：國史館藏，129000003153A。
- 《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廖崇聖》，臺北：國史館藏，129000026725A。
- 《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劉翼凌》，臺北：國史館藏，129000000217A。
- 《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羅劍雄》，臺北：國史館藏，129000004977A。
- 《特種檔案》，臺北：黨史館藏，特 14。
- 《國民政府檔案·宣慰南洋報告書》，臺北：國史館藏，001000005473A。
- 《國民政府檔案·緬甸戰役得失評判（四）》，臺北：國史館藏，001000005729A。
- 《陳誠副總統文物·林蔚文先生抗戰日記節錄》，臺北：國史館藏，008000000616A。
- 《會議紀錄》，臺北：黨史館藏，會 5.3/180.2。
- 《蔣中正總統文物·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〇一）》，臺北：國史館藏，002000001917A。
- 《蔣中正總統文物·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〇四）》，臺北：國史館藏，002000001920A。
- 《蔣中正總統文物·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〇五）》，臺北：國史館藏，002000001921A。
- 《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重要協商（一）》，臺北：國史館藏，002000000370A。
- 《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遠征軍入緬（一）》，臺北：國史館藏，002000000373A。
- 《蔣中正總統文物·遠征入緬（二）》，臺北：國史館藏，002000002115A。
- 《戴笠史料·戴公遺墨—人事類（第 4 卷）》，臺北：國史館藏，144000000034A。
- 《戴笠史料·戴公遺墨—人事類（第 7 卷）》，臺北：國史館藏，144000000037A。
- 《戴笠史料·戴公遺墨—政治類（第 2 卷）》，臺北：國史館藏，144000000002A。
- 《戴笠史料·戴公遺墨—訓練類（第 1 卷）》，臺北：國史館藏，144000000024A。



《戴笠史料·戴公遺墨—組織類（第1卷）》，臺北：國史館藏，144000000014A。

（二）中文日記

《蔣中正日記》，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2006C37。

林美莉編，《王世杰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三）中文回憶錄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5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

（四）英文

Co-operation with the Chinese, Records of Foreign Offic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 K., Kew, FO 371/31633.

Political Situation in Free China, Records of Foreign Offic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 K., Kew, FO 371/31644.

Political Warfare in the Far East, Records of Foreign Offic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 K., Kew, FO 371/31787.

Political Warfare in the Far East, Records of Foreign Offic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 K., Kew, FO 371/31788.

Political Warfare in the Far East, Records of Foreign Offic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 K., Kew, FO 371/31794.

## 二、專書

（一）中、日文

太田常藏，《ビルマにおける日本軍政史の研究》，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67。

日本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ビルマ攻略作戰》，東京都：朝雲新聞社，1967。

吳淑鳳等著，《不可忽視的戰場—抗戰時期的軍統局》，臺北：國史館，2012。

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第五編：對外關係》，臺北：國史館，2015。

李盈慧，《抗日與附日：華僑、國民政府、汪政權》，臺北：水牛出版社，2003。

汪朝光主編，《再認識與再評價：二戰中的中國與亞洲民族獨立運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金光耀、王建朗主編，《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秦郁彥編，《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東京都：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

張朋園、沈懷玉編輯，《國民政府職官年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張瑞德，《無聲的要角：蔣介石的侍從室與戰時中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7。

陳鴻瑜，《緬甸史》，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2016。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海外黨務工作》，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8。

## （二）英文

Bayly, Christopher and Tim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The Fall of British Asia, 1941-1945*.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Cady, John F. *A History of Modern Burm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

Charney, Michael W. *A History of Modern Bur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Lin, Hsiao-ting.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 Vancouver: UBC Press, 2006.

McLynn, Frank. *The Burma Campaign: Disaster into Triumph, 1942-4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U Maung Maung. *Burmese Nationalist Movements, 1940-194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Yellen, Jeremy A.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When Total Empire Met Total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 三、期刊論文

### （一）中文

林孝庭，〈二戰時期中英關係再探討：以南亞問題為中心〉，《近代史研究》，第 4 期（2005），頁 32-56。

侯中軍，〈二戰爆發前後國民政府的中法英軍事結盟計劃〉，《近代史研究》，第 3 期（2019），頁 67-82。

馬振犢、邱錦，〈抗戰時期國民黨中統特工的對英合作〉，《抗日戰爭研究》，第 3 期（2006），頁 160-192。

賈中福，〈國民外交的近代意蘊〉，《理論學刊》，第 1 期（2010），頁 102-105。

廖文碩，〈情報與外交：從檔案論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1937-1946）〉，《成大歷史學報》，第 56 號（2019），頁 91-131。

蕭明禮、朱浚源，〈日本侵緬之戰（1940-42）與臺灣的角色〉，《亞太研究論壇》，第 67 期（2020），頁 1-40。

齋藤照子，〈二戰時期日軍對緬工作機構—南機關再考〉，《南洋資料譯叢》，第 2 期（2009），頁 49-56。

藤井元博，〈中国国民政府の対日戦略と軍事作戦—1942 年のビルマ戦を事例として〉，《戦史研究年報》，第 22 號（2019），頁 1-29。

蘇聖雄，〈關鍵環節：第一次緬甸戰役中的林蔚及其參謀團〉，《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集刊》，第 113 期（2021），頁 77-130。

（二）英文

Kyaw, Toe Toe. "A Study on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Myanmar (1886-1945)," *Hinthada University Research Journal*, Vol. 5, No. 1, 2014, pp. 103-113.

Selth, Andrew. "Race and Resistance in Burma, 1942-1945,"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20, No. 3, 1986, pp. 483-507.

四、專書論文

朱宏源，〈中日首戰緬甸（1942 年）與華僑華人〉，黃自進、潘光哲主編，《中日戰爭和東亞變局》。臺北：稻鄉出版社，2018，頁 123-196。

五、學位論文

Clipson, E. B. "Constructing an Intelligence 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onial Security Services in Burma, 1930-1942," PhD diss., University of Exeter, Exeter, U. K., 2010.

六、網路資料

"Government of Burma Act, 1935," Myanmar Law Library, <http://www.myanmar-law-library.org/law-library/laws-and-regulations/constitutions/government-of-burma-act-1935.html> (accessed July 10, 2021).

（責任編輯：林彥宏、董百坊）